

SHEN CONGWEN
XIAOSHUO XINLUN

liuhongtao zhu
刘洪涛 著

沈从文
小说新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洪涛 著

〔沈从文 小说新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303-07403-1

I. 沈… II. 刘… III. 沈从文(1902～1988)-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354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http://www.bnup.com.cn>

出版人: 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 24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1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定价: 16.00 元

序一

钱谷融

我已经好久不动笔了，但是接到洪涛要我为他的新著写序的电话，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一是因为洪涛是我的学生，曾经有好几年愉快相处的日子；二是他毕业之后，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勤奋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可喜可贺。但是，这“爽快答应”当时毕竟是一时激动，事后动笔却成了一件难事，竟然一拖再拖，直至今日才动笔，心里不免有些不安。

《沈从文小说新论》是洪涛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一部专著。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了《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1997)、《〈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2003)等专著，显示了他学术上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皆有新的开拓。而这部《沈从文小说新论》虽然晚出，也是熔铸了洪涛近十年的辛劳，经过不断加工、充实而成，其中不乏一些新的发现与见解，这是我感到十分高兴的。因为学术探索是无止境的，一部好的学术著作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研磨，况且沈从文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大家，认真研读他的作品，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能够增强我们的审美感受与理解能力。

我很欣赏洪涛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和学风。艺术美和我们的审美能力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文艺研究与理论批评的最终目的，就是发现、继承和弘扬这种美及其审美能力。这也是我们的文艺研究与理论批评为什么要以作家作品为

本的原因。因为艺术美及其审美能力不是空洞的，而是人类创造的，它就储藏和表现在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之中，我们正是通过阅读、感受和理解它们来获得这种承传，提高这种能力的。而作为一个研究家和批评家，其根基就在于此，他的眼光、功力、水平与研究能力，无不与对于作家作品，尤其是第一流的经典作家作品的喜好、研读与理解连在一起，而理论批评的长进最终依赖于对于作家作品更深入、细致的感悟和研究。比如李白、杜甫、鲁迅、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就是这样的大家，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一些独特的文学精神与艺术特点，就像种子一样；后人研究它们，就如同把这些种子撒向大地，在各种各样的土地上，经过不同文化的培育，结出不同的果实。所以，细读经典作品，不仅终身受益，一辈子用得到它；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把握艺术原创的精华，避免简单地用别人现成的理论来套作品。如果这样，文学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原创性。所以，在文艺研究与理论批评中，新的理论和观念当然是需要的，好的理论总会促进我们的思维和研究，给我们带来好处；但是，它们不应该脱离艺术美及其审美能力而存在；如果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就很容易陷入空洞与教条。

以上都是我在读洪涛的专著《沈从文小说新论》时想到的。写成后才感觉到，同样的意思我可能在给我的学生上课时多次讲过，洪涛恐怕也听过多次了。这里不厌其烦老话重提，既是应现实的需要，也藉此重温一下昔日的师生情谊，以寄托我对洪涛的思念。

2004年5月于华东师大

序二

(美国)金介甫

刘洪涛教授请我给他这本大作写序，我很以为荣。记得十年前一个曾编过美国中文报纸文学副刊的美籍华人刚从中国回来。她喜爱沈从文的作品，在沈老生前曾访问他和他夫人张兆和先生。我问这位中国文学爱好者，大陆学者中除了凌宇，吴立昌，向成国，刘一友等有名的沈从文专家外，还有哪些优秀的年轻学者，有什么有趣的文章，她立即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刘洪涛教授，他的研究很突出，很有独创性。她复制了一份刘教授的文章，寄给我，文章虽不长，可是研究观点很新鲜，我从中学了很多东西。之后我们通信，交换意见。2002年在凤凰县举行了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的庆典，盛大的学术会议中，我终于有机会当面认识这位很有才能的学者。1980年第一次去湘西我也算“年轻”，2002年秋天第三次去湘西我年龄已经过了半百，看到中国有这么一批新的文学学者和沈从文专家，我高兴极了。我在7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沈从文及其作品，那时他的作品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在国内研究沈从文很不方便，海外学者和华侨垄断了“沈从文研究”，现在不一样了。80年代的中期大陆和台湾都出现了沈从文热，现在沈从文热已经冷却了一点，但还是有不少大陆的学者继续研究沈老。人文科学大都是冷门，很多人下海，可是有很多人继续研究文学，我很佩服他们。其实我常常觉得沈从文的著作就是一个浩瀚的海洋，要研究它们，一定要学好游泳，要善于抓住每篇作品中的精妙之处。我们也要学怎么做一

一条章鱼！刘洪涛是这样一个学者，他不只是熟悉沈从文那一代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而且他对中外文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美学理论，中外文学经典作品都很熟悉，所以才能贡献这么重要的文学研究成果。刘教授作了多年的研究才把博士论文修改完成，这我很理解。我在1977年写出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又花了十年的功夫，我的沈从文传才问世。与其说研究沈从文比较晚出书是一种职业病，不如说我们都想学沈老的认真！

这本书的贡献很多。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很细腻，刘洪涛教授看沈从文的小说看得也很仔细，文章也写得很细腻。他在沈老的文本中所发掘的象征和暗示，我觉得都是很新鲜的，我再读沈老的小说时，这些文学作品也变得更新鲜。尤其是刘教授解读《边城》、《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市一妇人》、《月下小景》等作品，他给我们解决了几个谜。这本书的附录中，刘教授也解释了沈从文作品怎样暗示沈老和张兆和，高青子，他的九妹和大哥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经验。

刘洪涛教授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很深。这本书前一部分写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主义和非理性，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观点。研究者如王润华和我会同意刘教授这个比较特别的论点。我们最近的论文也强调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主义和“颓废”理论（这是赞扬沈老的小说而不是批评它们；作品如此微妙！）。刘教授分析沈从文小说怎样写“时间”特别重要，特别有独创性。沈从文总是强调小说的故事性和客观态度，在现代作家中这算是少数的立场。国内沈从文专家对沈老著作与湘西的历史、民族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很深刻，贡献很大。刘教授写湘西的形象在沈老作品中的地位，他的观点很新鲜。但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值得商榷：沈从文后期的作品“不再有故事，就很难再有湘西”。

这本好书应该给国内外文学研究界很多的启发，我希望大家慢慢看，慢慢考虑这些新鲜的观点。

2004年10月10日于美国新泽西州

目 录

序一	钱谷融(1)
序二	(美国)金介甫(3)
导论 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	(1)
一、沈从文小说存量统计	(1)
二、沈从文小说的思想价值	(6)
三、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14)
四、小说艺术的拓展与创新	(22)
第一章 非理性与原始性	(27)
一、非理性与原始性的关系及其根源	(28)
二、沈从文为何表现非理性与原始性	(35)
三、湘西原始文明形态	(42)
四、态度的“原始性”与原始精神	(62)
五、情欲在都市背景中展开的三个层面	(70)
六、非理性精神的延展与变异	(80)
七、非理性精神的升华与生命熔铸	(86)
第二章 民族想象与国家认同	(93)
一、王朝体制与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苗族	(94)
二、苗族传奇：背景转换及其功能分析	(101)
三、苗族形象的消解与“中华民族”归属感的产生	(108)
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120)
五、《长河》及其他：走向国家认同	(145)
第三章 沈从文小说的时间形式	(154)
一、叙事时间与《边城》结构及人物的“自由意志” ...	(155)

二、叙述时间与命运的呈现形态	(158)
三、反复叙事与“地志小说”的生成	(161)
四、时间意识：历史思考和生命体验的维度	(169)
第四章 沈从文小说的故事形态	(175)
一、“故事”与“情节”在现代小说中的地位	(175)
二、小说情节设计的多种类型	(183)
三、民间故事与佛经故事	(187)
四、口头故事形态与《月下小景》框架故事集	(194)
第五章 作为叙事手法的客观化与象征	(204)
一、客观化叙事在现代小说中的地位	(204)
二、意象与象征	(212)
三、叙事者的态度	(224)
附录 沈从文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原型考证	(228)
一、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228)
二、九妹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241)
三、沈从文与沈云麓	(251)
参考书目	(262)
后记	(266)

导 论

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

一、沈从文小说存量统计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30、40 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地位崇高。1948 年，郭沫若在《抗战文艺丛刊》第一期上刊登《斥反动文艺》一文，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论及沈从文发表在 1948 年 1 月 3 日天津《大公报》上的文章《芷江县的熊公馆》。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撰写此文是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斥

导论
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

反动文艺》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沈从文文学地位在80年代以降的崛起，可以和一大批因机缘或政治保驾得以驰骋文坛的“作家”的命运相对照：当那些“作家”如日中天之际，沈从文还是一件“出土文物”，封埋30年，刚见了天光，人们沉浸在“发现”的惊喜里，学者的使命，除告诉读者沈从文何许人也，还要在长长的“钦定”现代作家队列中，为他谋一个“正统”的位子。但很快，那些“作家”便被读者遗忘，也遭到史家否定，沈从文却跻身于20世纪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为读者熟知喜爱，更受学者重视。

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掀起的中国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又赶上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二者合力，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家排座次。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金介甫是第一个。他在《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7月中文版）引言中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金介甫反映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西方汉学家的普遍意见。在这段文字中，“少有的几位”“伟大”的说法，以及和鲁迅并列，都是极高的赞誉。1994年，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4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其小说卷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等九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却把茅盾等排除在外，由此引起强烈反响。在文库的小说家排名中，沈

从文列第二位。编者给沈从文获得如此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此外，近年对沈从文频繁使用的“大师”称号肇始于此。1995年，钱理群、吴晓东推出了排在最前列的七位现代作家的名单。他们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①一文中写道：“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沈从文在全体现代作家中排名第三。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二十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遴选前一百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谢冕、王德威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上述产生于90年代的排名，有的针对作家沈从文，有的针对小说家沈从文，有的针对沈从文的个别小说，虽然范围大小不一，却都在二、三名之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早在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②应该说，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政治风云和时间的考验，沈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沈从文一生到底创作了多少篇小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立一个统计的标准，因为沈从文不少作品，文类界限本不易确定。如《公寓中》(1925)和《遥夜》(1925)，都是自叙传，都写作者在北京的困苦绝望生活，但第一篇被当成小说，后一篇却算

① 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沈从文：《从文家书·湘行书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56页。

作散文。我如此处理，一般是循《沈从文文集》和《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中的惯例，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缠。但也有个别例外，如《青色魔》在《沈从文文集》中被列为小说（见第 7 卷），在《沈从文全集》中，却当成散文（见第 12 卷），在这种矛盾情况下，我依据自己的判断，将它看成散文。此外，沈从文一些中长篇小说，或者以不同篇名在报刊上分别发表，如《神巫之爱》、《阿黑小史》^①、《芸庐纪事》^②、《雪晴》^③、等；或者以同一篇名连载，如《旧梦》等。我在统计时，对它们只按一篇作品计算一次。《月下小景》是一部框架故事集，但其中各篇相对独立，故按每篇独立计算。依据这一标准统计的结果，沈从文从 1925 年 1 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公寓中》，到 1947 年完成的《雪晴》，24 年间

① 《阿黑小史》各章节，按最初在杂志上发表的时间顺序为：《雨》（1928 年 11 月 10 日）、《秋》（1932 年 9 月）、《病》（1932 年 11 月 1 日）、《婚前》（1932 年 12 月 1 日）、《油坊》（1933 年 1 月 1 日）。1933 年 3 月，新时代书局出版《阿黑小史》单行本，目次为：“油坊”、“秋”、“雨”、“病”、“婚前”。这目次与故事情节线索多有不合。花城出版社的《沈从文文集》第 5 卷收入《阿黑小史》，其目次做了调整：“油坊”、“秋”、“病”、“婚前”、“雨”，但与情节仍有脱节处。《沈从文别集》和《沈从文全集》才把《阿黑小史》的目次调整到与情节完全一致，即“油坊”、“病”、“秋”、“婚前”、“雨”。但上述版本的《阿黑小史》都忽略了沈从文 1928 年 10 月发表的《采蕨》。这篇作品中的人物也是阿黑和五明，在报刊初次发表时，篇末注明“阿黑小史第五”，从情节顺序看，它应是《阿黑小史》的首篇。因此，完整的《阿黑小史》包括：“采蕨”、“油坊”、“病”、“秋”、“婚前”、“雨”，共 6 节。我在统计沈从文小说篇目时，将《采蕨》归入《阿黑小史》没有单独计算。

② 《芸庐纪事》初载于 1942 年 10 月 15 日、1943 年 1 月 15 日《人世间》第 1 卷第 1、第 3 期，当时只发表了“第一”、“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因触犯禁忌被搁置。1947 年 2 月 1 日、16 日，3 月 1 日、15 日、29 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重新发表本篇时，补充了“第三”部分。但这三部分是否《芸庐纪事》的全本？《沈从文文集》和《沈从文全集》对此的处理不同。《沈从文文集》（第 7 卷）把“《人世间》本”与刊登于 1943 年 12 月 8 日《文聚》第 2 卷第 1 期上的小说《动静》合为新的《芸庐纪事》，《沈从文全集》（第 10 卷）则采用“《益世报·文学周刊》本”，把《动静》排除在外。依本人私见，完整的《芸庐纪事》应该有四部分：“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大先生，你一天忙到晚，究竟干吗？”；“我动，我存在：我思，我明白一切存在”：“动静”，因为它们有很强的内在连贯性。

③ 《雪晴》是一部包含四节的中篇小说，这四节的标题依次是：“赤魔”、“雪晴”、“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

共创作小说 200 篇(部)。

在这 200 篇(部)小说中,还有长、中、短篇之别。这种区别当然是相对的,我主要是依据篇幅长短、格局大小、内涵丰富与否,以及学术界惯常的认定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加以确定。但相比较茅盾、巴金等人的长篇、中篇小说规模,沈从文的同类作品或许只能算中短篇小说了。统计结果为:长篇小说占 5 部:《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旧梦》(1928)、《一个女演员的生活》(1930—1931)、《边城》(1934)、《长河》(1938—1942)。中篇小说 14 部:《在别一个国度里》(1926)、《篁君日记》(1927)、《山鬼》(1927)、《长夏》(1927)、《呆官日记》(1929)、《一个天才的通信》(1929)、《一个母亲》(1929)、《神巫之爱》(1929)、《冬的空间》(1930)、《凤子》(1932—1937)、《阿黑小史》(1928—1933)、《八骏图》(1935)、《芸庐纪事》(1942—1943)、《雪晴》(1945—1947)。短篇小说 181 篇。从篇数上看,沈从文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排第一,无愧于“高产作家”的称誉。

沈从文的 200 篇(部)小说发表于不同时期。对于跨年代发表的作品,我按首次发表的年代统计一次,统计结果是:1925 年 22 篇,1926 年 20 篇,1927 年 24 篇,1928 年 21 篇,1929 年 25 篇,1930 年 21 篇,1931 年 13 篇,1932 年 15 篇,1933 年 11 篇,1934 年 5 篇,1935 年 6 篇,1937 年 6 篇,1938 年 1 篇,1940 年 4 篇,1942 年 1 篇,1943 年 2 篇,1945 年 1 篇,1946 年 2 篇。这份统计显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第一年就进入喷发期,高产持续了 6 年。1931 年以后,产量虽然开始逐渐下降,但单个小说的篇幅呈增加趋势,质量上更精益求精。学者们公认,小说是沈从文文学成就最重要的代表,小说是他奉献给现代中国文坛最具特色的艺术成果,小说是他荣誉之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二、沈从文小说的思想价值

面对着这 200 篇(部)小说,注视着沈从文文学地位的冉冉上升,我在欣喜之余,却一次次陷入到困惑之中。沈从文是一个谜,这不仅有汪曾祺先生试图解开的“转业之谜”^①,更有他的文学创作之谜。记得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刚确定以沈从文小说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反响不错。一个师弟问我学位论文的思路,我颇为豪迈地一挥手,说:“我准备重新确立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位师弟反问:“你以为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我却一时无言以对。后来,即使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圆满完成学业后,很长时间里,我仍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沈从文的文学定位问题也困扰着其他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一些前辈学者如严家炎、凌宇都发出过类似的感叹。^② 称沈从文是一个“谜”,并不表示我们缺乏对沈从文的细部研究,相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积累了十分可观的量。^③ 要真正解开沈从文文学创作之谜,需要准确、全面地把握他的文学定位,还沈从文本来的历史面貌。如前所述,对沈从文的评价有过大起大落,但即便在沈从文声誉如日中天的近 20 多年,无论对沈从文文学价值否定还是肯定,也都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① 参见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收入《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② 参见严家炎:《为谜样的传主解读》(载《读书》1993 年第 5 期),文中多有“令人难以置信”、“奇迹”、“神秘”等说法。凌宇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 年第 2 期)中说:“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本质是什么?它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却是一个难解的文学之谜。”

^③ 请参阅刘洪涛、杨瑞仁主编:《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将出),其中收录海内外出版的沈从文研究专著约 44 部,报刊论文约 1920 余篇,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藏 1995—2003 年间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25 篇。

纵观中国的沈从文评论史，即可发现造成这种结果的症结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的沈从文评论，以否定者居多，论者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沈从文排挤到边缘，甚至扫地出门，郭沫若、冯乃超的文章只是其中登峰造极之作。20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逐渐受到肯定性评价，但研究者的方法论，并未完全超出阶级话语的藩篱。沈从文的政治立场，被套上“进步”的光环；他对人性的描写，被抹上阶级和社会的底色；沈从文的创作，被纳入到现代左翼文学传统中去。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在有政治保驾的“红色文学传统”中给沈从文寻找一个位置。事实上，沈从文根本不需要，也不适合这一位置。从80年代中期开始，摈弃了阶级话语的沈从文研究者，又自觉或不自觉，试图将他纳入到现代文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中去，或者从启蒙文学的角度理解沈从文。^① 20年多来，启蒙话语不断丰富、深化、增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阐释系统，在沈从文研究的不少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同时，依靠这一阐释系统，对

^① 如凌宇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言说方式、话语方式及思想内涵，都显示出“启蒙特征”，它隶属于鲁迅开创的启蒙传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标识之一”。赵园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一文中，责怪沈从文在“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之间，没有引入“历史发展”的概念，只是将湘西和都市两种文明类型作“静态的比较”，是“‘形态’的而非‘动态’（演变过程）的比较，因而难免不是片面化了的比较。”她恳切地指出：“人类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当然不是为了使自身停留在‘自在状态’。而沈从文笔下的‘城市病’、‘文明病’或多或少也是‘历史进步’的结果，——至少是为了‘历史进步’而必得付出的代价。至于更健全的社会，不消说也只能在跨越这弊病丛生的‘文明时期’之后才会到来。”人类真正的进步依靠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不是打倒它。现代文明弊端丛生，但弊端的克服仍需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赵园基于这样一种简单明确的现实逻辑，朴素的社会进化和发展观，否定了沈从文这一创新的思想和文学价值。在她眼中，沈从文如此处理湘西与都市的关系，甚至是落后于时代的：“二十世纪所提供的世界历史眼光，完全有可能使沈从文以更宽阔的时空尺度度量湘西那一种文化，然而沈从文却始终未能据有这尺度。”赵园对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与都市关系的这一负面认识显示了启蒙话语的影响，这限制了她进一步挖掘其深邃内涵和意义的努力。

属于根本性的沈从文文学创作定位的问题，仍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沈从文之谜依旧。

“人性”与“生命”的张扬，是沈从文小说根本性的立足点，也是解开沈从文之谜的关键所在。沈从文关于人性和生命的论述颇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的：“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他还说自己创作《边城》，是“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他也劝戒别人要表现人性：“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③ 80年代初，吴立昌的论文《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1983)^④拉开了系统研究沈从文文学创作中人性因素的序幕。吴立昌认为，“对人性的执意追求”，是贯穿沈从文世界观的一条主线，也是解开沈从文创作之谜的“一把钥匙”。作者着力强调了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物的人伦之善和诗情之美，以及沈从文把摄取人性美的焦点对准士兵、妓女、水手、女佣等下层人民，甚至革命者的政治意义。在吴立昌看来，沈从文表现的人性是人的阶级性的补充，具有社会批判价值和功能。凌宇在1986年发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⑤，16年后，于2002年又发表了《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⑥，这两篇文章凝聚了作者对沈从文“生命”之说的深入思考以及思考的进展。作者注意到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的不同层面。凌宇认为，人性更深邃、更基本的层面是包蕴着肉体和精神力量

① 《沈从文文集》第11卷，44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② 《沈从文文集》第11卷，45页。

③ 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载天津《大公报·文艺》1936年3月29日。

④ 文载《文艺论丛》第17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⑤ 文载《文艺研究》1986(2)。

⑥ 文载《文学评论》2002(6)。